

访谈

《巨流河》，一部满载中国近代苦难的家族记忆史；一部大时代悲欣交集的抗战史，新旧交替时代的女性奋斗史；一部台湾文学、中华文化走入西方世界的启示录；一部用生命书写壮阔幽微的天籁诗篇！读罢《南渡北归》，请读一读齐邦媛的《巨流河》。

《巨流河》封面



《巨流河》： 怅惘千秋一洒泪

文\海南日报记者 蔡葩

读罢全书，深深的惆怅中满怀敬意，对那个已逝年代的美好人物，他们的精神气质、他们舍身为国的勇气、他们历经苦难却依然“温和洁净”的高贵品性……文学评论家、哥伦比亚大学王德威教授评道：“《巨流河》是一本惆怅之书。”在作者齐邦媛笔下，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个人史、家族史，更是一部我们甚少阅读到的战争史、爱情史，它所饱含的历史忧伤，国难家仇，令人掩卷沉思，由两个人的家国情怀牵出的一个纷繁复杂的时代画卷，“如此悲伤，如此愉悦，如此独特”。

跨不过的巨流河

作者齐邦媛，台湾大学外语系教授，高龄 87，一位在台湾文学界、教育界备受尊敬的名字。2004 年，已经 80 岁高龄齐先生开始动笔，历时四年写出了回忆录《巨流河》。在台湾出版后，洛阳纸贵，好评如潮，成为台湾文化界一大盛事。于是内地的三联书店在 2010 年 10 月引进了此书，2011 年 4 月出版，在大陆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，读者称“《巨流河》是一种前所未有的阅读体验”。巨大的历史忧伤，是人们心头跨不过的巨流河。它的价值，在于它是 20 世纪中国人苦难和奋斗的一个真实、感人的血泪记录。

巨流河，位于中国东北地区，是中国七大江河之一，被称为辽宁的母亲河。南滨渤海与黄海，西南与内蒙内陆河、河北海滦河流域相邻，北与松花江流域相连。这条河古代称句骞河，现在称辽河，清代称巨流河。影响中国命运的“巨流河之役”，发生在民国十四年（1925 年），当地淳朴百姓们仍沿用着清代巨流河之名。

本书的记述，从长城外的巨流河开始，到台湾南端恒春的哑口海结束，跨度百年，厚重沧桑。1924 年，齐邦媛生于辽宁省铁岭，6 岁随父搬家至南京。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，她逃难至重庆，后考入武汉大学。1947 年大学毕业后，进入台湾大学教书，从此就留在了台湾，又从台湾负笈美国做研究。齐先生学贯中西的素养，细腻丰富的文笔，从亲历者的角度，将中国历史的大事，个人情感深处的幽微，娓娓道来的背后，隐含着深刻的伤痛和不屈的精神力量。

正如王德威教授所发问：经历更传奇者也大有人在，但何以这本书如此受到瞩目？我以为《巨流河》之所以可读，是因为齐先生不仅写下一本自传而已。透过个人遭遇，她更触及了现代中国种种不得已的转折：东北与台湾——齐先生的两个故乡——剧烈的嬗变；知识分子的颠沛流离和他们无时或已的忧患意识；还有女性献身学术的挫折和勇气。更重要的，作为一位文学播种者，齐先生不断叩问：在如此充满缺憾的历史里，为什么文学才是必要的坚持？评论家丁东说，作者既有很好的国学功底，又有很高的英文修养，全书既是严谨的史笔，又是优雅的散文。现在国内出版的回忆录也很多，对历史抱有严谨态度者已是上品，兼具美文品质者十分罕见。而一般大陆作家的回忆录虽有文采，但有历史感者不多。

求仁得仁，何憾之有？

翻开《巨流河》，那些我们熟悉又陌生的名字——浮现，他们带着自己的爱与痛复活在我们跟前。用新近流行的话说，《巨流河》似乎是一本为“失败者”致敬的书。然而，作者齐邦媛绝不同意这种说法。齐世英，作者的父亲，是民初东北的精英分子。早年受到张作霖的提拔，曾经先后赴日本、德国留学。在东北当时闭塞的情况下，这是鲜有的资历。然而青年齐世英另有怀抱。1925 年他自德国回到沈阳，结识张大帅的部将、新军领袖郭松龄（1883—1925）。郭愤于日俄侵犯东北而军阀犹自内战不已，策动倒戈反张，齐世英以一介文人身份慨然加

入。但郭松龄没有天时地利人和，未几兵败巨流河，并以身殉。齐世英从此流亡。渡不过的巨流河——多少壮怀激烈都已付诸流水。晚年的齐世英在台湾充满孤独的日子里郁郁以终。但正如唐君毅先生论中国人文精神所谓，从“惊天动地”到“寂天寞地”，求仁得仁，又何憾之有？而这位东北汉子与台湾的因缘是要由他的女儿齐邦媛来承续。

《巨流河》所述人物众多，除了贯穿始终的灵魂人物齐世英，抗战空军英雄张大飞、著名美学家朱光潜、哲学家钱穆、名教授吴宓等等，在齐先生的笔下——开口说话，令人荡气回肠。用王德威教授的话说，齐世英先生的一生是此书的“潜文本”。齐邦媛眼中的父亲一身傲骨，从来不能跻身权力核心。但她认为父亲的特色不在于他的择善固执；更重要的，他是个“温和洁净”的性情中人。这历经死亡和人生困顿后依然能够“温和洁净”，令人感慨唏嘘。

张大飞是全书最让人伤心欲绝的人物。在齐邦媛的笔下，张大飞英姿飒爽，亲爱精诚，他雨中伫立在齐邦媛校园里的身姿，他虔诚而充满矛盾的宗教信仰，他深情而克制的诀别信，无不充满青春和死亡的浪漫色彩。但这正是邦媛先生所要向世人道明的：他们之间的关系不容如此轻易归类，这无关男女，无关英雄，因为那是一种至诚的信托，最洁净的情操。王德威教授说，我们今天的抗战想象早已被《色·戒》这类故事所垄断。当学者文人口沫横飞的分析又分析张爱玲式的复杂情事，张大飞这样的生，这样的死，反而要让人无言以对。面对逝者，这岂不是一种更艰难的纪念？

一个声音未曾老去

在《巨流河》里，我们首度读到另一面的朱光潜先生（1897—1986）。作为中国现代最知名的美学家，抗战时期在乐山武汉大学任教，齐邦媛幸运地成为他的得意门生。他赏识她的才华，亲自促请她从哲学系转到外文系。一般人对于朱光潜的认识止于他的美学著作，事实上朱光潜也是 1930 年代“京派”文学的关键人物。齐邦媛对朱光潜抗战教学的描述显露了朱教授较少被提及的一面。他在战火中一字一句吟哦、教导雪莱、济慈的诗歌，与其说是与时代脱节，不如说开启了另一种响应现实的境界——书中有一个细节令人难以忘怀：一天朱光潜在讲华兹华斯的长诗之际，突有所感而哽咽不能止，他“快步走出教室，留下满室愕然。”就此令人注意的不是朱光潜的眼泪，而是他的快步走出教室。朱教授也许难以预料，他的这一平常动作深深烙在齐世英青春的心灵里，他的为学精神也影响了她的一生。

一生著述、译著丰富的齐邦媛，1970 年代在“国立编译馆”供职，主持新编台湾中学国文教科书。早期的台湾和新时期以前的大陆相似，在意识形态化的大环境下，语文教科书以意识形态为主导，孙中山、蒋介石的文章比重很大，别的选文也着眼于政治需要，差不多成了政治教科书，学生十分反感。齐邦媛借重一批开明教授的支持，冒着政治上的极大风险，改变了这个格局，让语文回归语文，文学回归心灵，获得了成功，正是齐先生功德无量的举动，对日后的台湾文化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

《巨流河》是一位女性学人对历史的见证，对命运的回顾。齐邦媛先生在她的叙述中一天天成长，“终而有了风霜”。她的娓娓道来让我们热血喷张，感受时间的无情，世事的变迁，然而，唯有一个声音未曾老去。评论家王德威说，那是一个“洁净”的声音，一个跨越历史、从千年之泪里淬炼出来的清明而有情的声音。我们久久聆听，久久回味，却是“怅惘千秋一洒泪”……

读书札记

一部华人开拓 海洋的悲壮诗篇

文\海南日报记者 陈岚桦

中国人对于大海的情结历来是复杂的。一方面，我们沉醉于 600 年前郑和七次奉使西洋的恢弘气势，开创了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海上航运的壮举，把一个东方古国博大精深文化呈现给世界；但另一方面，郑和航海给中国人带来的荣光如流星闪现，转瞬即逝。明清两朝推行数百年的“片板不许下海”的“海禁”，令中国人曾经拥有绝对海上优势荡然无存。

即便在改革开放 30 多年后的今天，中国人远离海洋的现状依然没有多大改观。历史上的短视继续支付着的现实代价。

澳籍华人、自称为非职业历史拓荒者的雪珥先生，在新近出版的《大国海盜——浪尖上的中华先锋》（山西人民出版社，2011 年 6 月）一书中，钩沉了在明清两朝，东南沿海边民向海洋开拓的历史。早在西方开启大航海时代之前，中国人便凭借着领先于世界的造船航海技术，将中国的海疆，从日本海一直伸展到马六甲乃至印度洋。他们本足以遏制西方的殖民东扩，让龙旗飘扬到世界的每个角落。可明清两朝却将沿海边民逼下大海，成为“海盜”。中国人走向深蓝的历史机遇，一次又一次地被固守土地的专制王朝扼杀了。同样，被抹杀的是那些在海上开疆辟土的勇士们。雪珥这本书，既是为这些所谓的“海盜”们做的一曲挽歌，更是对明清两代放弃海洋的深刻反思。



《大国海盜》封面

雪珥在书中叙述了中国东南沿海的边民是如何沦为“海盜”的历程。我国东南沿海人多地少，难于单纯依赖农业为生，沿海边民还从事海上贸易和渔业。从朱元璋开始的严厉海禁，严禁一切私人海外贸易，导致沿海民众经常出洋，是破坏大明安定团结的不稳定因素，这一刀切的禁令，以牺牲沿海民生为代价。祖祖辈辈靠海吃海的沿海边民，突然被“政策性下岗”，原来的渔业、商业被“紧急关停”，政府又难以解决再就业安置问题，这就逼迫沿海民众另谋生计。而此时，“海禁”又导致国际市场上中国的丝绸、茶叶骤然紧缺，价格猛涨，中国国内商人们为求自保，冒着掉脑袋的危险拿起枪杆子组成海上武装集团，中国沿海的边民，迫于生计而沦为“海盜”，并向东南亚拓殖。从明初的陈祖义，到沦为“倭寇”的王直，再到闽南郑芝龙、郑成功家族，从日本海到印度洋广阔的洋面上，都活跃着中国闽粤人的身影。

雪珥在书中指出，在欧洲历史上，海盜从来就不是纯粹的卑贱、黑暗反面角色，倒是经常伴随着罗宾汉式的侠客、哥伦布式的开拓者的光环。在西方崛起的过程中，海盜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。雪珥说，“英国人并不用 Pirate（海盜）来形容德雷克，而是另一个与 Pirate 很相似的单词——Privateer（私掠）。Pirate（海盜）与 Privateer（私掠）的区别在于，后者持有国家颁发的劫掠许可证——私掠船，实际上就是官方授予的“海上民兵”，是一国海上武装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在英国，“海盜”被制度性地纳入了英国海权的拓展之中，海盜、海商、海军的“三位一体”，令曾经羸弱、贫困得无法供养一支正规海军的大英帝国，迅速成为一个“日不落帝国”。难怪英国经济学家杰文斯无比自豪地说：“北美和俄罗斯平原是我们的玉米地；芝加哥和敦德萨是我们的粮仓；加拿大和波罗的海是我们的林场；澳大利亚和西亚是我们的牧羊地，阿根廷和北美的西部草原有我们的牛群；秘鲁运来它的白银，南非和澳大利亚的黄金流到伦敦；印度人和中国人为我们种植茶叶，而我们的咖啡、甘蔗和香料种植园遍及西印度群岛；我们洋洋得意、充满信心，极为愉快地注视着帝国的威风”。

雪珥曾兼任着悉尼当地一家中文报纸的编辑。他曾经把那张郑和“宝船”与哥伦布首次环球航行时的旗舰的对比图，放上了该报的头版头条，那高达 30 多倍的巨大反差，令哥伦布的旗舰看起来就像是澡盆中的玩具。但那个澡盆中的玩具，却最终赢得了世界，而那伟岸的郑和舰队，却成了历史澡盆中的一个渺小的玩具。尽管历史没有假设，但仍能激起有识之士内心深处的隐痛，和更大的文化与制度方面的反思。

乱的岁月。齐邦媛（右）和妹妹、母亲在离



1947年，齐邦媛在武汉大学留下的笑容。